



世界历史故事

(三十三)

姜 浩 主编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与科学社会主义	员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	愿
圣马丁堂集会：第一国际的建立	愿
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愿
普法战争及第一国际的态度	愿
色当要塞的白旗	猿
巴黎公社	猿
瓦尔兰和他的道路	愿
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瓦尔兰	愿
积极的国际会员赛拉叶	猿
革命卫士里果	愿
救国委员会的灵魂费烈	愿
巴黎的人肉筵席	猿
鲍狄埃和他的《国际歌》	猿
从死刑里活过来的诗人	愿
巴黎公社最早的英烈之一杜瓦尔	愿
热血志士弗路朗斯	愿
忠贞不渝的斗士德勒克吕兹	猿
公社最卓越的将领达布罗夫斯基	猿
“蒙马特尔的红色姑娘”米歇尔	猿
拉萨尔派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	猿
爱森纳赫派及其代表人物	员

第二国际与恩格斯	员缘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员园
“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	员缘

马克思恩格斯与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理解，就是作为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涉及的是前者。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正像任何一种社会思想或理论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一样，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它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818 年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父亲是个自由主义的开明律师。两年以后，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在莱茵省巴门市（即现今伍佩尔塔尔市）诞生，父亲是个保守的工厂主，莱茵区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政治生活最活跃的地区。1836 年，马克思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中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在柏林期间，他加入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行列。1841 年，恩格斯中学还未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1842 年到柏林服兵役时也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从黑格尔哲学辩证思维的宝库中吸取营养，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为起点，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这时，在哲学上他们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立即投入了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1842 年 12 月—1843 年春，担任自由主义反



对派创办的《莱茵报》的主编，这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切身体验到普鲁士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虚伪性。他在报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例如，《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尽管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开始认识到靠纯理论的批判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他对黑格尔关于法律、历史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产生了怀疑，而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表示赞同。

正当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展开斗争的时候，1842年12月，恩格斯服役期满，来到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最发达的英国，并立即投身到工人斗争的洪流中去，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并同宪章运动领导人和其他工人组织建立了联系。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实际生活，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哲学同社会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却主张哲学应当从纯思辨的天国里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正是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他们认识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了。

1843年12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从社会舞台重新回到书房。当时马克思正处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哲学不

能回答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的强调政治”，他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也是完全脱离的。为了探求“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在深入钻研哲学的同时，大量阅读经济学、历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集中精力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理论，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同年 10 月，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迁居到政治生活沸腾的巴黎。在那里，他一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法国工人运动领袖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联系，结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者，一面继续为创立科学的理论而辛勤探索。

1844 年 1 月，《德法年鉴》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两篇文章。文章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些精辟的论断不仅把科学理论对人类解放的极端重要性阐述得一清二楚，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必须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的思想，标志着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了创立科学理论，马克思从 1844 年底至 1845 年 1 月集中全力研究英、法等国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梯也尔等人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联系



的观点给他很大启发。通过对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对比，有助于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探寻国家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还不能揭示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经济学的丰富知识使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从 1844 年起，他又集中力量钻研政治经济学著作。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从财富的分配角度对阶级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不了解生产劳动过程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生产劳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不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三种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的研究，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对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出了如下结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认识到私有制是生产运动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当马克思获得了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之后，继续深入地开辟理论发展的道路。他纯熟地应用辩证法研究生产运动的过程，得出了“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的结论。经过艰苦的劳动，

马克思吸取了整个欧洲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最高成果终于迈出了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决定性一步，他宣布：“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入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恩格斯则是从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成这一转变的。恩格斯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后，在深入工人运动的同时，钻研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为宪章运动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和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稿。“在数不胜数的准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1844年11月，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卡莱尔鼓吹的“英雄崇拜”、“天才崇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经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5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他们倾心交谈了各自的政治理论观点，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见解，从此开始了他们创立科学的世界观的伟大合作。同年，合著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第一次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

1845年，恩格斯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

作根据大量调查材料，论证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将不可遏制地推动它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并提出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理。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逐渐形成，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就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要求。费尔巴哈把人作为他的哲学的核心，脱离实践，脱离社会，把人的自然属性看作是人的本质，用这种观点解释社会现象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1844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着重阐明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检验人的思维的真理性的标准。恩格斯说，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至此，决定人类历史发展最终根源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破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并未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就此止步。他们又从历史发展的一般再深入到历史发展的个别，具体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探索资本主义剥削的

秘密，产生了剩余价值学说的萌芽。

在 1841 年，当马克思钻研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还没有深刻理解，而是用流行于哲学界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物化劳动脱离了劳动者，成了劳动者的异己的敌对力量。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本人所能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的价值就越被贬低。这种异化不仅反映在生产结果与劳动者的关系上，而且还反映在生产活动中，其明显表现就是，劳动像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如果没有强制，“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正是他同生产活动相异化的结果。而占据劳动者的成果，支配他们劳动的正是资本家。这就清楚地表明，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异化，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产物，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成为通向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起点。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而 1845 年代中期，他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取得的成就又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1847 年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已不再用“异化”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是把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出发点。他指出，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则用属于他所有的生产资料换取工人的劳动。这种劳动不仅补偿了工人所消耗的部分，而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在这里

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但他已十分明确，在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由于劳动而从资本家手中取得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成为资本家财富的来源。

同时，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基本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利润等经济范畴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工人的劳动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成为商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尽管这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还不像他的哲学思想那样得到完整而系统的阐述，还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对于确立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基本概念，还没有最终形成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某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已经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已被奠定。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

19世纪 50年代，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阅行第二号书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很多书。一次，图书管理员好奇地对那座位上的中年读者问道：

“博士先生一次可以研究好五十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对于这意外的问题，博士先生风趣地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人们如果要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就不能只在一块草原上赏花啊！”

管理员听了很佩服，这位博士先生就是当年流亡伦敦的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

1818年1月1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父亲是著名的犹太律师，学识渊博，略带自由主义色彩。马克思从小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这样的家庭条件，被学校认为是“得天独厚”，并希望他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写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这篇气度非凡的作文，被校长赞为“相当好。此文以思想丰富和结构严谨而引人注目。”

1835年秋天，马克思遵从父命，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教授们对他的评语大都是“勤勉”和“用心”，但在1836年1月签发的学业证书上，校方在“附注”中写道：“据告发，该生曾将查禁的武器携至科伦。”事实真相如何，至今仍不清楚。马克思的父亲早在一个月以前就曾向校方写了一份申请书，表示同意儿子转到柏林大学读书。

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心，马克思入学不久便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成了他们组织的“博士俱乐部”的后起之秀。一年以后，他在家信中写道：“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父亲当时重病在身，半年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渐渐地，法学已经被列为他研究哲学的辅助学科。1841年春，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现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灵”的倾向，开始摆脱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论文本身获得的评语是“不但思想丰富，很有洞察力，而且兼备渊博的知识。”1841年9月，马克思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便回乡看望已经订婚五年的未婚妻燕妮。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威斯特华伦男爵，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大人。

1842年10月，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主编。他以战斗的精神，无懈可击的逻辑，撰文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一度因鼓励市民拿起武器反抗政府的税收而被捕，由于他据理反驳，终于无罪获释。

1843年11月，《莱茵报》被查封。半年以后，马克思偕同新婚的妻子迁居巴黎。1844年初，与卢格（1808—1880）合办《德法年鉴》，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等文章，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表明他的世界观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不久，马克思便被法国政府驱逐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5年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回国；1845年12月又被普鲁士反动当局驱逐到巴黎；同年11月又被驱逐到伦敦。近四十年间，燕妮陪伴马克思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写道：“我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卡尔·马克思永远不会成为当代的马克思。”

由于贫困的折磨，马克思夫妇在昏暗的异国他乡，悲痛地埋下了四个孩子。当妻子积劳成疾，马克思为了照顾家务不得不暂时停笔，因而影响《资本论》的写作进度时，他曾说过“最大的愚蠢莫过于结婚”。但是，在他们家中，烦恼总是暂时的，每当他和燕妮的目光彼此相遇时，往往忍不住会立即大笑起来。在爱琳娜的记忆中，她的双亲“总是快乐的一对。”

燕妮五十岁时，马克思回乡看望母亲，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每天都去瞻养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当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真有说不出的惬意。”燕妮病逝时，马克思伤心地说：“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在被利己主义的冰水浸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特别珍视他和恩格斯在并肩战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在流亡伦敦的岁月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往来。有一次，恩格斯隔了几天没写信来，马克思便在信中风趣地说：“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泣还是在欢笑？你睡着了还是醒着？”马克思一生都非常感激恩格斯的无私援助，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把自己的困难告诉恩格斯。有一次天气非常寒冷，由于缺煤，大白天一家人不得不呆在床上，燕妮



噙着泪水央求说：“还是写封信给恩格斯吧！”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姆指。半辈子依靠别人，每当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俩人从事着一项合伙的事业……。”

在伦敦街着，孩子们称呼他“马克思老伯”，为了逗引孩子们，马克思休息时常爱在水盆里玩海战游戏，直到把纸船舰队全部烧毁为止。马克思还和孩子们玩过一种叫“自白”的问答游戏。在问到他的特点是什么时，马克思的答案是“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终生信守“为人类工作”的道德准则而鄙薄私利，特别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后，更是历尽艰辛，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最后病逝在工作台前，年仅六十五岁。

圣马丁堂集会：第一国际的建立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是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工人运动高涨中产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它举起“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的旗帜，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848年革命之后，欧洲开始进入一个黑暗的政治反动时期，革命迅速走向低潮。然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被这种暂时现象所迷惑，他们坚信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也一定必然到来！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科学预见，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成为现实了呢？

十九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个急剧的发展阶段。蒸汽机的数量迅速增加，铁路长度一再延伸，工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然而，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而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化。1857年，一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象一股加带着暴风雪的寒潮，无情的袭击着资本主义世界。这次经济危机，不仅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而且也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了灾难。

1857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新起点，它把各个领域的革命斗争，重新推向高潮。五十年代末，世界上的国际工人运动正在日趋高涨，农民骚动逐渐抬头，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都日趋活跃起来。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斗争，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南北战争，都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成为当时的历史典型。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复兴和重新高涨，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以利开展当前的革命斗争，也就日益成为无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了。到六十年代，各国工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当时有三件大事，对于促进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南方的棉花输出量，大幅度缩减，这就严重的影响了英国的棉织业，使它们顿感原料不足，棉花日益恐慌。当时，英国的巴麦斯顿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政治上公然表示支持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并且打算用武装支援他们；这个计划如果成为事实，美国北方的广大劳动群众，就会更遭涂炭。这时候

英国工人紧急动员，强烈反对，终于挫败了巴麦斯顿政府的反动企图，给美国北方人民提供了有力的援助。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英、美两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一次团结与合作。

1851年，英国伦敦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次盛会不仅引起世界各国贸易界人士的瞩目，而且也吸引着各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当时，法国的三百多工人，和德国的一部分工人代表，也前往伦敦，参观这次博览会。法、德工人来到伦敦，同英国工人的会面和接触，在客观上使三国工人更加接近，并为他们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就国际团结问题进行商讨和广泛交换意见。

此外，波兰起义问题，更直接地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1830年，波兰人民要求摆脱俄国控制，要求民族独立的起义，风起云涌，沙皇俄国政府则进行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这个事件引起欧洲各国工人、特别是英国广大工人的深刻同情。这年 11月 和 12月，英国工人在圣詹姆士堂，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声援波兰起义人民，谴责沙俄政府的残暴政策，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公开出面干涉。特别是在第二次会议以后，与会者更以英国工人的名义，给法国工人写信，呼吁他们加强国际团结，采取联合行动。

六十年代初期的这三件事，对增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果说在四十年代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仅仅是个战斗口号的话，那么到六十年代初，它已经开始为广大工人所接受、所理解，成为他们争取的目标了。

随着各国工人往来的日益频繁，建立一种国际间的、有